

学术泥鸿录

李百齐◎著

XUESHU NIHONG LU



海
军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泥鸿录/李百齐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027 - 8149 - 1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594 号

责任编辑:苏 勤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30 千字 定价:68.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这是一本自选集，选取了作者自 1988 年以来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 39 篇文章，分为中共党史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研究、政府海洋管理研究三个专题。自 1988 年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主办）发表处女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2 年布拉格会议新探》以来，已陆续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共党史研究、国际共运史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本人在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工作期间（1988—2001 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在浙江海洋学院工作期间主要从事政府海洋管理研究，而在这次文集编辑中，自感学术价值稍高的还是这两个领域，其中尤以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更令自己满意。

本人自读初中起，就对政治、历史问题感兴趣，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对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业绩更有着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劳动，因为没有书读，偶尔借得邻居一本《中国通史》，竟不知阅读了多少遍，因而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农村 10 年，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认真地听到底。那时农村报纸少，我就经常跑到大队办公室蹭报纸看，特别是对《参考消息》更爱不释手，每得到一份，总是从头看到尾，因而对国内外大事谈起来总能如数家珍。记得 1965 年 1 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国务院设了 16 位副总理，自己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这 16 人的名字，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生平事迹更了解地非常清楚。1978 年高考，我历史科得了 96 分，实在与我的这一爱好有关。大学期间，读的是国际共运史专业，其中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三门功课是专业课，自己对中共党史情有独钟，学习尤为努力，大学毕业学士学位论文就是探讨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这次我也特地收录了该论文。大学毕业后，教授过 6 年国际共运史与科学社会主义，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但学术成果不多。在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共党史，前后发表了 50 多篇有关论文，其中有 9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全文转载，有几篇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这让自己至今想起来仍感

欣慰。2001年到浙江海洋学院工作后，我又写过几篇党史研究论文，《中国现代史》也转载过两篇，但由于学科建设和申办硕士点的需要（本人担任过几年浙江省重点学科——行政管理学科的负责人），大约从2005年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政府海洋管理，在海洋环境、海洋生态、海洋资源保护，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海岸带综合管理，沿海地区工业布局调整等问题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一批还值得一提的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文章多为对策性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但学术性不是很强。现在本人临近退休，利用教学、科研不太忙的机会，将二十多年的心血之作做了一番梳理，选取3个专题，汇编成册，取名《学术泥鸿录》，意谓学术研究生涯中的痕迹记录，算是半生笔耕的总结吧！

回忆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经历，自己还是取得了一批具有或高或低学术价值的成果，当然，这些多集中在党史研究领域。本人研究历史，坚持围绕填补空白、补充前说、匡正谬误3个方面进行选题，每篇文章都尽力凸现其学术性。纵观收入该文集的这19篇党史论文，在这3个方面，都有文章涉猎。虽然有些独创性成果，至今仍没有被主流学术界认可，如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探讨，但我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回忆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写成，自感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文章有不错的学术价值，但国内几家大刊物都不敢刊登，据说是怕引起政治麻烦。而自己又觉得文章学术上有较大突破，不愿拿到小刊物发表，一放就是五六年。感谢《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叶永锡老师，他欣赏我的文章，于2002年、2004年在该《学报》上登载了两篇这个专题的文章。更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的诸位编辑慧眼识物，把我的两篇文章都给予了全文转载，使它得以见到更多的国内同行。但我的观点至今仍是一家之言，遍观这几年的出版物、电视剧对这个问题仍众口一词，还是重复传统的说法，可见传统观念的惯性之大。古代先贤赋诗著文向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说，我非大家，但向来做学问也求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要勇于创新，不人云亦云。在这一点上，自感还是坚守了操守的。遍观收入该文集的文章，自己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会议的评价，对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析，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探讨，都属于独辟新径，勇于对传统的观念提出挑战，能从历史史料入手，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以往的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传统结论。在本文集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占了不少篇幅，这也是本人有新见解的部分，比以往的研究有新的发掘，或向更深方向推进了一步。如对国民党顽固派及其领袖蒋介石在

抗战中对共产党搞的摩擦，我认为不能完全将其归咎于蒋的政治反动，而是从国共两党的政治成熟、两党政治领袖的政治老练出发，指出这种摩擦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使读者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类问题，能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历程艰难的历史必然性来看待蒋介石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避免了过去一味将这个国民党领袖人物的活动用“反动本性”来解释的脸谱化模式，而用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来作更合理的解释。在研究中，我对蒋介石冠之于“成熟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我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几年时间放到了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上。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党史界在不少问题上观点仍不统一，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比如新四军为什么要选择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是谁决定的？对这些问题，我在研究中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作了详细的论述，相信读者看过我的文章后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历史研究中，我始终坚持要“论从史出”，即研究问题要以事实为依据。对同一件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充分的确凿的事实是能够说明一切的。

岁月匆匆，人生如梦。考取大学时的狂喜如癫，读大学期间的孜孜不倦，大学毕业后的意气风发，初调浙江海洋学院时的踌躇满志，这一切仿佛还在眼前，但自己却已年过花甲，到了退休的年纪了。回顾自己出生以来的60余年，前半部分可谓历尽坎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蹉跎岁月，令人感慨万千。但自己还是赶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抓住了1978年高考那个一生唯一的机遇，而更令我欣慰的是考取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大学四年，我们这一茬人是很勤奋的，当时的口号是“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十年夺回来”，在校园里，在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勤奋的身影，我们努力用知识充实自己，奠定了毕业后从事学术研究的较好理论基础。但我毕竟是在近30岁时才考取大学，拖儿带女去上学，学习中的分神是不可避免的了，加之毕业后为生活所迫，几度流离失所，所以一直不能全神贯注于一个学科领域，特别是到浙江海洋学院以后，由于学科建设需要，自己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政府海洋管理，而把自己喜欢的中共党史研究放到了一边，很多准备好的资料也没有派上用途，想起来，还是感到遗憾。但回顾毕业30年的治学经历，自己还是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聊以欣慰的成果。每当看到自己的观点被同行引用，自己的文章被他人著作中列为参考文献，有的文章被某些大学历史专业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我还是感到了一丝自豪。书海无边，事业茫茫，唯有尽其所能也就是了。自己作为从下层社会走出来的小人物，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农村10年，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学术熏陶，29岁读大学时才开始接触专业，大学毕业后又有几

年在为生活奔波，因而很难有大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学术界也难有大的影响，偶尔有朋友称我为中共党史专家，我总惶恐无地，自知实难副实——虽然山东省的人才网确实是将我放在历史专家之列的。回忆至此，我对自己毕业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又有些不知对错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把自己的一篇散文——《我与1978年高考》放在了附录中。这原是应我的家乡山东临朐县文史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先生之约写给该办公室编辑的《岁月留痕》的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我青年时期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希望朋友们看后能对我的人生有所了解。

借拙作出版之际，我也对在我的学术研究中给予了支持、帮助甚至督促的朋友、师长和同学、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边包括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刘庸安先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的李平生先生，山东理工大学学报主编尹玉吉先生，《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叶永锡、王燕先生，胜利油田职工大学的孙杰民先生以及浙江海洋学院的詹亚园、崔旺来先生等等。同时我也对本书责任编辑海洋出版社的白燕主任等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我也深情地感谢我的夫人和子女几十年如一日对我的学术研究所给予的理解和鼓励。

李百齐

2011年6月16日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编 中共党史研究篇

一、论第二次国共合作	(3)
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政策探源	(12)
三、两次国共合作之比较	(19)
四、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	(26)
五、新四军为什么要选择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	(33)
六、新四军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究竟是谁决定的	(39)
七、重谈“中共中央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	(43)
八、也谈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	(50)
九、论项英在皖南军部时期的历史功过	(56)
十、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历程艰难的历史思考	(61)
十一、英明的决策 艰苦的征程 ——写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55 周年之际	(67)
十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决策探讨 ——兼以纪念解放战争胜利 55 周年	(79)
十三、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91)
十四、解放战争中东北首先解放原因探析	(99)
十五、对建国初期党风建设的历史考察	(109)
十六、党在土地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述评	(116)
十七、毛泽东与林彪关系刍议	(122)
十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原因又探	(130)

第二编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篇

十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2 年布拉格会议新探·····	(141)
二十、外蒙古独立始末及其历史评价·····	(152)
二十一、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几点思考·····	(160)
二十二、坚持党的领导 再创社会主义的辉煌·····	(166)
二十三、中苏关系纵横谈·····	(172)
二十四、柬埔寨问题的根源和前景·····	(179)
二十五、论九十年代国际政治格局及斗争特点·····	(186)
二十六、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94)
二十七、“合作型信任”视域中的诚信政府 ——基于后工业社会维度的思考·····	(200)
二十八、当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改革若干趋势简析·····	(206)
二十九、从“掌舵”到“共享领导”：当代西方政府角色的嬗变·····	(213)

第三编 海洋管理研究篇

三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努力保护海洋环境·····	(225)
三十一、建设和谐海洋，实现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232)
三十二、论海洋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238)
三十三、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	(247)
三十四、对沿海地区新渔农村建设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251)
三十五、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	(258)
三十六、简论加强我国对围海造地的科学管理·····	(265)
三十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加强海岸带管理·····	(274)
三十八、新形势下构建和谐海洋的基本构想·····	(283)
三十九、对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289)
附：我与 1978 年高考——一个老三届眼中的恢复高考·····	(295)

第一編 中共党史研究篇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

摘要：第二次国共合作以酝酿时间长、过程艰难曲折而闻名于世，其原因在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成熟和彼此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次成熟、成功的合作，它不仅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两党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回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源于两党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正确处理了两党关系。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有利于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关键词：国共合作；民族大义；一个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两次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第二次国共合作尤以其酝酿时间长、历程复杂曲折、合作获得成功而具有世界现代史上政党合作的典型意义。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要求产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即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的文章，明确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大学教授王造时也提出了“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共同抗日”的口号^[1]。然而，由于国民党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共内战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展开。1935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攻，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2]。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也开始改弦更张，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谋求两党合作抗日。但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艰难，

双方的谈判长期难有实质性进展。直到“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方针，两党内战才基本停止。“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于让中共军队开赴前线抗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3]，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最终实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两党军队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摩擦和冲突，国民党更是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几乎每次都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内战”^[4]。虽然由于两党内部团结抗战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共合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之尖锐、斗争之复杂，两党冲突引起的政治震动之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与中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欧洲的不少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法国^[5]，都出现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阶级矛盾和内部冲突，如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王国政府、南斯拉夫共产党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都在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和斗争。但在这些国家以及不少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亚洲国家，或者由于共产党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自动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或者由于资产阶级政府长期流亡国外，而由共产党较轻易地掌握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或者由于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力量太弱，在斗争中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无产阶级独自担负起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责任，因而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远没有中国那样复杂和尖锐，处理起来也较为容易。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所以呈现出上述鲜明的特征，是由中国特殊的国内政治状况决定的。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进行过10年之久的战场拼杀，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两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伏下了深刻的危机。同时由于两党领导集团的政治成熟，各自对对方有透彻的了解，双方都努力在合作中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合作过程也就成了双方政治谋略、政治技巧的较量过程，这样合作过程的艰难曲折就不言而喻了。

与同一时期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不同，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由于所依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相对强大和政治上的成熟老练，该党的前身——蒋介石集团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成熟程度，因而能在国民革命时期轻而易举地击败其他反对力量，独占中国政权。到抗日战争前，经过长期复杂的内

部派系斗争，蒋介石已牢牢控制了中央政权，成为国民党各派共同承认的领袖，成为具有熟练政治技巧和较高谋略水平的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两党合作的谈判阶段，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这是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出于其阶级本能和政治锐敏，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力量的快速增长自始至终怀有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因而曾竭尽全力进行遏制，这是他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必然举措。不过，面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和亡国危险，国民党最终还是对共产党做出了一定的政治让步，表现了应有的求实精神，蒋介石并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并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这恰恰证明了该党的政治成熟，显示了蒋介石的政治远见。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政党。与国民革命时期不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量空前壮大，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个基本的问题完全正确地得到解决”^[6]。中国共产党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造就出了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领袖集团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成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由于政治上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对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利用抗日削弱共产党的企图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坚持在军队和根据地问题上决不放弃独立性。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原则，及时地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既顾全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使人民革命力量在此期间得到空前壮大。

总之，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一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合作，对双方来说也是一次清醒的合作。由于两党的政治成熟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双方合作呈现出既联合又斗争，既并肩抗日又相互戒备且摩擦不断的矛盾景观。正是基于这种对立统一，两党都能以抗日大局为重，维持了长达八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了合作的历史使命。

二

由于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时，国共两党也都从合作抗战中获得了巨大回报。由于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在上争得了大国地位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中国国民党通过抗战，提高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蒋介石在战后初期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国领袖。如果不是后来的内战，按照 1946 年 1 月政协会议的精神，中国能走上和平、民主、建国之路，蒋介石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像法国的戴高乐、土耳其的凯末尔^[7]那样的历史地位。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和接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及接收 100 万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达到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军队数量达到 400 余万，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也同样提高了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空前壮大，实现了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成立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国的政治纲领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异常艰难曲折，但以圆满成功而告终，这是国共两党策略运用得当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次成熟的合作。所谓成熟的合作，不在于合作双方没有历史的积怨和利益的对立，不在于合作过程中没有冲突和摩擦，而在于合作双方都能以大局为重，较好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可以说，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 28 年的民主革命奋斗史上，以反帝最坚决而著称于世。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最早打起了抗日的大旗。“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遭受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的情况下，仍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合作进行了东北局部抗战和察哈尔抗战^[8]。1933 年 1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提出了“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的建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此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谋求与国民党所有派别订立合作抗日协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合作谈判。“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其后的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团结抗日又作出了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在统一战线内部，面对顽固派的无理进攻，共产党始终以大局为重，即使迫不得已进行反击，也是严格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即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的休战原则。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才把

国共合作几次从破裂的边缘拯救过来，使之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有着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光荣传统。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就把“恢复中华”作为党纲内容之一。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就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1905年，他因“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决心东渡求学“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9]。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也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致力于国家统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抗日信念还是坚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且领袖欲极强的政治家，于公于私，他同样不愿让自己的民族遭受灭亡的厄运。”^[10]抗日战争期间，对反法西斯阵线中的盟友英美等国领导人的一些干涉内政的做法也有所抵制，如这一时期发生的“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因为事关中国主权，还是断然拒绝了史迪威的要求，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外，抗战期间，蒋介石还经过努力，积极争取英美等国放弃原来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一废约运动并不彻底，但毕竟是朝着国家主权完整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诚然，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表现得非常被动并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少错误的方针，但综观蒋的全部言论和行动，他毕竟还是主张抗日、注意维持国共合作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本质区别。对蒋介石一度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应该进行客观分析。其一，这一政策本身并不排斥“攘外”。其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王明路线统治下，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强调以“民主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3]。蒋介石一度视中国共产党为比日本更大的“心腹之患”，也非空穴来风。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围剿”的力度有所减轻，并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谋求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这说明蒋介石还是有抗日和联共要求的。由于国共两党积怨太深，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中间也出现过反复，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5年间，也是多次调整了自己的统战政策，经历了由下层统一战线到全民统一战线，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因此蒋介石在此期间的矛盾心态和政策的反复也应客观看待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如果任何一党不以民族大义为重，

在民族危亡面前，仍斤斤计较阶级私利，不愿做出任何政治让步，那么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坚持下去。可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是国内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团结对敌、共谋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根本政治前提。

三

在当前，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后，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已成为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如同当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样，需要两岸领导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爱国主义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爱国与否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两岸和平谈判的根本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1]的基本方针，“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2]，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的政治诚意。而李登辉之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三不方针”，甚至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抛出“两国论”的荒谬主张，图谋“台湾独立”，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两岸和平谈判的政治基础。台湾当局如不想像当年的汪精卫集团那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遗臭万年，就必须幡然悔悟，以民族大义为重，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这应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经验，我们还可以看到，不管国共两党在历史上对立多么严重，不管双方分歧有多大，在民族危机面前，两党可以并且必须坐下来谈判，以谈判来弥合分歧，找到共同点，从而最终达成协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与曲折，双方立场差距很大，但通过谈判，毕竟淡化了仇视，在感情上有了靠近，同时也通过谈判各自更好地认识了对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反过来又促使双方考虑如何弥合分歧，为进一步谈判扫清障碍。由此可见，在两党合作问题上，有分歧并不可怕，对和平或合作所持的立场有重大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两党不能坐下来谈判。在台湾问题上，“实现和平统一，必须进行两岸谈判”^[1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相信，“凭着中国人的智慧，通过对话和商谈，在一个中国的框架

内，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办法和途径”^[13]。但时至今日，台湾当局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所谓“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甚至挟洋人以自重，妄图依靠外国势力达到“台独”的目的，这只会导致玩火自焚。正像当年我们不可能与汪精卫谈判如何“降日”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可能与任何人谈论所谓“台湾独立”的议题。对我们来讲，两岸谈判，是为了和平统一。“而‘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两国论’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不是谈统一，而是谈分裂，当然不可能被中国政府接受”^[14]。另一方面，复杂的世界局势和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也决定了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拖下去，全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在历史上，当国共两党的矛盾不可调和、谈判无法进行下去时，两党军队之间就要爆发战争。1946年全面内战的爆发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党历经10个月的谈判最终破裂的必然结果。虽然当时中国人民并不愿意发生战争，但历史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也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力争用和平方式完成统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二是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13]。因此台湾当局有必要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采取务实的态度，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

回顾历史，我们还可得出结论，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相互作出让步，充分尊重政治现实是谈判和合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妥协和让步也就没有了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进行之初，蒋介石曾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先交出军队和政权，力图对其实施“招安”^[8]，实际上是借合作之名吃掉中国共产党，对此共产党当然不会同意。共产党为了使合作得以实现，首先做出了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取消了两个政权对立的政策，尊蒋介石为国家领袖，提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示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日。在各方推动下，蒋介石也最终放弃了通过谈判取消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的企图，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确立。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和两种不同的政权，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政权和在解放区存在的民主政权，实际也是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存在两种制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十年内战造成的政治现实，二是蒋介石能从实际出发，为合作抗日而承认和容许了这种现实的存在。

新中国建立以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经历了“解放台湾”到“和平